

中国改革模式的理论概括

——《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机理分析》介评

喻华伟

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近20年。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控制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的制度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挥。20年的改革实践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成绩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

但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于这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理论更显得苍白无力。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学界对这一创举似乎还没有给出系统的、全面的、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延福撰写的转轨经济学专著《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机理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试图对此进行一点深入的探讨。该书从社会主义的恒定要素和市场经济的二重属性入手,全面探讨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最优性、风险性、可控性,研究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形式、路径、阶段和临界点,比较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两大模式——中国模式与苏东模式的利弊优劣,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般理论模型,使中国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与已有的转轨经济学著作相比,本书具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第一,将中国20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抽象为一个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既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渐进模式”,也不是国内学者所说的“针灸疗法”,而是一场“受控核聚变”。我们知道,物理学上的受控核聚变一旦成功,人类将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能源问题的困扰,为人类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但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旦成功,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发展速度、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这可能是现代中国人对人类作出的最重大贡献。用“受控核聚变”来归纳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说明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性、深刻性、剧烈性、创新性、受控性和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社会控制论模型。运用这一模型,可以比较圆满地解释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稳定地进行并取得显著的性能,也能够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前苏联东欧的改革模式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和经济的大滑坡。

第二,注重实证分析,以中国20年的改革实践为原型,进行理论综合和抽象,寻找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例如,作者在书中将中国的改革进程划分为十个阶段,从“思想解放”到“精神文明建设”,恰好构成了一个循环;将中国的改革理论抽象为四个主义,即综合主义的目标取向、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权威主义的控制手段、渐进主义的操作技巧,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哲学;认为中国改革过程存在三大定律,即周期律、递减律、迂回律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对中国改革实践长期跟踪观察、深入思考而提炼出的结晶。

第三,对现有的改革理论提出挑战。书中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例如,对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作者将其归纳为“邓小平定理”,认为这是邓小平经济理论当中最具特色、最具创新性的思想。邓小平定理是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理论,2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定理的展开式。又如,对于市场经济,作者认为它不完全是中性的,而是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它具有高效率的特点,而作为一种分配机制,它又具有分化的内在力量。对此,必须要有另外的机制进行适当的抑制。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难点和风险,前人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疑虑,都是来源于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再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作者提出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结构”,其中,国有经济相当于钢筋,集体经济相当于石子,个体私人经济相当于沙子,而市场经济相当于水泥,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的大厦。这种说法也是很新颖生动的。

当然,本书仅仅是中国转轨经济学的一家之言,书中还存在许多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论证,还缺乏逻辑化、形式化的证明;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是否已经越过临界点,还需要有量化的指标进行支撑;对于中国改革模式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唯一可行的模式,也需要实践的继续检验。

(作者单位 湖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曾国安)